

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杨伟 陈潇潇

[摘要] 作为活跃在1920-1930年代日本诗坛上的中日混血诗人,黄瀛的诗歌蕴含着语言、文化以及存在论上的“混血性”。正是因为这种“混血性”,导致其诗歌被拒斥于中日两国的文学史之外。而在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正由以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中国=中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有可能涵盖更多边缘性内容的今天,不仅可以将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部去进行再评价,也可以把黄瀛作为一个有些另类的中国诗人,将他的诗歌还原到同时代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其独特的价值和可能带来的生产性。

[关键词] 黄瀛 混血性 文学史重构 再评价

引言

作为活跃在1920-1930年代日本诗坛的中日“混血”诗人,黄瀛不仅以富有异国情调的诗歌成了日本诗坛的宠儿,还在诗坛建立了广泛的交友关系,而且他也是促成中国新诗大量越境到日本的重要中介者。关于黄瀛在日本现代主义诗坛上的地位,或许可以从1934年东京BON书店(東京ボン書店)出版的黄瀛诗集《瑞枝》中管窥一斑。作为一家创办了《新精神》《诗学》等现代主义诗刊的先锋书店,BON书店追求的是为诗歌而诗歌的纯粹诗,并致力于出版最能体现现代诗理想的诗集,曾推出了安西冬卫、春山行夫、竹中郁等一系列代表当时现代主义诗歌最高水准的诗集。据《BON书店的幻影》一书所记,在这些个人诗集中,春山行夫的《丝绸与牛奶》(1932年)的印数为200部,定价为25钱,安西冬卫《亚细亚的咸湖》(1933年)的印数为300部,定价为25钱。而黄瀛的《瑞枝》则装帧最为豪华,印数多达400部,定价亦最为昂贵,高达1日元80钱。^[1]不难看出,《瑞枝》受到了最

高的礼遇。且其出版后也是好评如潮,比如诗人安藤一郎就评价道:“《瑞枝》具备代表日本后期自由诗的价值,且同时对黄瀛自身而言,也不啻其意义深远的青春谱”^[2]。

但颇为奇怪的是,黄瀛却在战后遭到了日本文坛的遗忘,直到苍土舍1982年推出《瑞枝》的复刻版,1984年出版《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才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小小的黄瀛热。1994年,佐藤龙一作为生前采访过黄瀛的传记作家,掌握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传记《黄瀛——他的诗及其传奇生涯》(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为黄瀛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史实资料与大致的年谱。而在安藤元雄等主编的《现代诗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中,也专门收录了“黄瀛”词条。这些都表明,黄瀛作为卓有成就的日语诗人,也作为一个有着跨文化身份的传奇人物,已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和史学家们的兴趣。但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还大都停留在人物传记或文坛忆旧的框架内,并没有完全改变黄瀛诗歌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上的边缘地位和遭到日本诗坛

日渐遗忘的事实。

1 被遗忘的黄瀛及其被多重定位的可能性

当然,要一一追溯黄瀛被日本诗坛遗忘的原因或许并不那么简单,但正如冈村民夫指出的那样,“这一重大的缺失既不是因为其诗歌水平的低下,也不是源于其原创性的匮乏,更不是因为其缺乏现代性,而毋宁说是因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潜藏着语言、文化以及存在论上的‘越境与混血’”^[3]。换言之,这种由“越境”和“混血”所表征的诗歌特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造就了其他诗人所无法模仿的特殊魅力的同时,也使他的诗歌成为了一种有些异端的少数文学,从而很容易被关闭在主流诗歌史的门外。

而追溯另一个原因,或许与黄瀛在诗坛上的微妙地位不无关系。比如,作为混血儿,他无疑是诗坛的“单独者”,但却不甘寂寞,广泛参与了各种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诗歌团体。尽管不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但却反倒赢得了不受束缚的自由,可以逾越团体的界限,而成为诗坛的自由人士。比如,他既是《铜锣》杂志的同人,也是《碧桃》和《草》等杂志的成员,同时还大肆活跃在《诗与诗论》等追求纯粹诗的现代主义诗刊上。他这种在诗歌团体上的越境性不仅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某个特定诗派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导致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得归咎于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把日本文学视为‘日本人的文学’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冈村民夫,2018:19),因此,身为中国国籍的黄瀛被摒弃在“日本文学”之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日语文学”这一概念。这显然与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包括亚洲人和欧美人在内的外国人用非母语的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关联。对这些外国人用日语创作的文学进行研究,已然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如果从“日语文学”的视域重新审视黄瀛及其诗

歌,我们不能不说,像彗星般划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黄瀛不仅没有过时,毋宁说蕴含着历久弥新的价值,以至于黄瀛“在今天乃是应该被更广泛地知晓和重新评价的‘崭新’诗人”(冈村民夫,2018:19)。而“对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也能对‘日语文学’的拓展成为一种具有批评性和生产性的催化剂”(冈村民夫,2018:25)。

笔者注意到,在积极倡导对黄瀛及其诗歌进行评价的学者中,黄瀛的传记作家佐藤龙一认为,“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4]。而奥野信太郎则在《黄瀛诗集跋》中一边竭力主张在日本对黄瀛诗歌进行鉴赏和评价的必要性,一边不忘呼吁道:“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5]。不难看出,与佐藤龙一把黄瀛看作是“日本诗人”不同,奥野信太郎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来定位的,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而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之所以能够同时成立,除了恰好印证出作为混血儿的黄瀛身份的边界性和双重性之外,也很可能体现了两者在把握黄瀛特质时的不同诉求。笔者认为,当佐藤龙一主张把黄瀛作为“日本诗人”来定位时,他是希望把黄瀛诗歌作为日本诗歌的一部分来置于日本文学内部加以评价的,而当奥野信太郎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则暗示了把黄瀛及其诗歌置于中国文学范畴内来进行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显然,佐藤龙一和奥野信太郎在给黄瀛及其诗歌定位时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视域,但笔者注意到,佐藤龙一所使用的“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其实是一个有所保留的句式,即是说,他是在充分意识到黄瀛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日本诗人”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诉求,这一点可以从“不妨”这一带有倡议性质的表述中得到佐证。因为从国籍的归属上看,黄瀛乃是中国人,而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严格说来,“日本诗人”并不是对黄瀛的最准确定义。同样,奥野信太郎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当他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不忘用“深谙日语之神秘”这一修饰语强调了黄瀛作为“中国诗人”的特

殊性,即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人”不同,黄瀛不是用中文,而是“借助了日语,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奥野信太郎,2010:254)。或许奥野信太郎深知,作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中国诗人”,黄瀛被拒斥于中国诗坛之外亦属无可奈何,但也惟其如此,他的诉求才显得越发急迫:“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

笔者注意到,同时代的诗友们大都是以“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为关键词来勾勒出诗人黄瀛形象的主要特质的。显然,“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所蕴含的阈限性和模糊性在暗示了对黄瀛进行准确定位之困难性的同时,也预示了对黄瀛进行多种定位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以循着佐藤龙一提示的路径,从日本文学的流变中来审视黄瀛及其诗歌的革命性力量。而无论是从“少数文学”,还是从“日语文学”的视域出发来评价黄瀛诗歌,都会带来对黄瀛诗歌的价值重估。而笔者注意到,在冈村民夫、佐藤龙一等黄瀛研究者们——尽管还为数太少——已经着手于把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部来展开研究的今天,循着奥野信太郎的思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将其诗歌置于同时代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来评价,或许同样具有可行性和生产性。

就像黄瀛因中国国籍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日本文学史之外一样,黄瀛的诗歌由于是用日语创作而成,从而阻碍了其在中国诗坛的流通。再加上黄瀛1930年底回国后一直从戎,除了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过数次短暂的见面之外,与中国文学界鲜有交集,其作为诗人的身份鲜为人知,因此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也并不奇怪。但我们知道,今天固有的文学概念正遭到解构,文学史的重构业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就像“日本文学”正由以前那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⁶⁾这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概念一样,或许“中国文学”的定义也面临着解体与重构,而有可能摆脱“中国=中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一封闭的定义,成为涵盖很多边缘性内容的概念。比如,像黄瀛这种身为中国人却用非中文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也不妨

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像黄瀛诗歌这种处在“边界地带”的东西既是日本文学中的“少数文学”,同时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有些特殊的部分,或称为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文学”。诚然,黄瀛的诗歌是日语写成的,且充满了日本元素,甚至是远离中国文学传统的,但也正因为其中的异质性和边缘性,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视野。而与此同时,置于中国新文学发生、流变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黄瀛及其诗歌,也很可能让我们去重新发现黄瀛的价值和局限性。

2 从中国新文学留日学生作家群看黄瀛的独特性

回顾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会发现,新文学作家主要有三个来源,即留日派、英美派和本土派。而毋庸置疑,其中最早出现的留学生作家群体是在日本,而且,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后来大都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变革的生力军。正因为如此,近十多年来,关注日本体验对中国学人,特别是留学生生存实感的影响,探讨“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发生的关系,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这可以从李怡的论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本朝《日本经验与中国新文学的激进主义》(《晋阳学刊》,2010年3期)、苏明《支那之痛: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性记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1期)等大量论文中得到印证。而更早则可以追溯到贾植芳的《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4期)等论文。

我们知道,创造社早期成员郁达夫、郭沫若等以留学生身份出现在日本,是在1913年和1914年,而黄瀛随母亲从中国移居到日本千叶县也是在1914年。尽管出生于1906年的黄瀛与出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出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有着10年甚至更大的年龄差,从而难免带来认识问题和感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但却因同样置身于1914年前后的日本而产生着不乏共性的日本体验。虽然黄瀛因中日混血儿身份不同于一般的留学生,但“支那”和“支那人”等歧视性话语在心中的所唤起的“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⁷⁾,却是

黄瀛与其他留日学生共同的创伤性记忆。一般认为,正是这种创伤性记忆催生了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人意识,以至于伊藤虎丸认为,创造社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是“在初期对日本人轻蔑‘支那人’发出了留学生的痛切的悲愤叫喊”^[8]。不用说,背负着“中日混血儿”身份的黄瀛则面临着既大致相同但却又更为复杂的境况,除了“支那人”等蔑称在心中唤起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从日本小孩那里听到的“杂种”等詈语更是催生了他身为混血儿的带有个体性的悲哀。所以,在黄瀛的诗歌里,作为“支那人”的创伤性记忆总是与“混血儿”的悲哀交织在一起,通常体现为一种并不激烈的——毋宁说有些隐忍而曲折的——民族主义情感。即是说,与留日学生们“倾向于在整体的群类生存而非个人生存角度来感受问题,或者说个人生存的遭遇也被他们抽象成了民族整体的境遇”^[9]不同,黄瀛似乎更倾向于从作为混血儿的个体性悲哀出发来感受问题,并把“支那人”的民族整体境遇具象化为“我”的个人遭遇来进行描写和抒发。与郁达夫让《沉沦》中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10]这种将个人悲剧与国家命运直接对接的悲愤叫喊不同,黄瀛则是借助在青岛天津路上品味中国兰茶的芳香,而达成了对中国人身份的认知,可即便他在宣称“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的光荣”^[11]时,也并不试图过分渲染其中的政治性意味,而是尽可能将其作为个人的内心事件来加以抒写,并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为与政治有所阻隔的艺术抒情和个人叙事。也正因为如此,在黄瀛诗歌里很难看到那种狂风暴雨般的呐喊或激进主义的口号。笔者认为,黄瀛诗歌因其所内含的作为“支那人”的创伤记忆足以成为中国新文学中留日学生文学的一部分,但又不能不说,其中充满了某些异质的元素,似乎很难严丝合缝地被涵盖在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留日学生文学中。比如,在黄瀛那里,就很难一目了然地看到个人生存欲望与国家民族大义的直接对接,而毋宁说作为身处中日两国夹缝中的混血儿,更多抒发的是对“我是谁”的追问,即对个人身份认证的困惑。

3 黄瀛诗歌中的身份认证困惑与“个人本位”立场

至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王一川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一视域出发来对苏曼殊作品的价值重估,他认为,在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中,现代性体验乃是体现为现代性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痛切探寻。主人公“‘三郎’的中一日混合身份和飘零身世,寓言式地透露出民初中国的现代性境遇的‘大恐惧’状况,以及个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执著与困窘”^[12],从而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境遇中的个人命运以及身份认证的困惑体验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其实,奥野信太郎早就注意到了黄瀛与苏曼殊的相似性,即从居住在横滨的一位华侨与日本女性所生的苏曼殊身上,看到了其与黄瀛一样身为中日混血儿的这一特性。^[13]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相类似,黄瀛的诗歌也是借助抒发混血儿的悲哀和困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认证的困惑体验。尽管黄瀛总是把焦点汇聚到个体的断零性体验上,执着地描写自己生存的不安感、漂泊感和创伤感,但事实上,他那看似属于个人的身世和命运,其实乃是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境遇紧密相关的东西。比如,他的跨民族和跨文化身世,其本身就具有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间特有的现代性气质。而不用说,混血儿本身就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纳入全球化世界的境遇中,随着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往来日益增多之后,由跨民族间通婚带来的结果。其次,黄瀛在国籍上属于中国,可又因从小接受的日本教育,而在文化认同上倾向于日本——这种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之间的错位,使他两个国家那里都无法获得百分百的归属感,从而表现为一种苏曼殊式的断零体验。“这种由国门错位而生的个人断零体验,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国个人的现代性体验中,具有一种典范性的意义”(王一川,2001:368)。即是说,在黄瀛和苏曼殊身上交织着的中日两国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身份错位构成了一种寓言,再现了民国初期中国留日学生

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断零体验。无疑,王一川对苏曼殊断零体验的有关论述提示我们,不妨把黄瀛及其诗歌也放置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史上去探寻其意义。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性体验总是涉及中国人对中国在现代全球性境遇中的生存价值或地位的直接体认,那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黄瀛恰恰是借助自己在日本体验到的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日混血儿的创伤记忆,既达成了对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全球性境遇中屈辱地位的痛切体认,也获得了作为现代性个体的生命自觉和自我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黄瀛的这种体认不是直接从国家或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个人身份的困惑和源自内心的断裂感和欠缺感等来实现的。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种“个人本位”的立场。在这一点上,黄瀛无疑与苏曼殊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而又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李怡从中国新文学的角度评价苏曼殊文学的焦点所在:

其实,如果放在我们这里所追述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角度,苏曼殊作品的独特意义同样十分的显赫:显然,苏曼殊在亦革命家亦僧人亦多情才子“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实,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很难再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色与传统之中了——(中略)这样的生命的自觉也正是挣脱主流人生哲学,渡向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李怡,2009:149-150)

而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把李怡对苏曼殊的论述稍加改动,就几乎可以原样挪用到黄瀛身上。比如,黄瀛在中国人与日本人、诗人与军人、多情才子与训鸽师等多重身份间矛盾徘徊的事实,也意味着他很难将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色和传统之中,以至于黄瀛喜欢把自己称之为“诗坛的自由人士”或者“流浪儿”^[14],游走于中日两国之间,穿梭于不同的诗歌团体或各种角色之间。不用说,那种自由总是与孤独、飘零、迷惑和执拗的自我意识相伴随,而从诞生的诗歌显然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学所缺少的“个人本位”立场,并体现为一以贯之的个人叙事,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

中国诗人,既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体验发生的具体案例,也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史上凸显出作为“少数文学”的独特意义。

而事实上,不同于黄瀛的个人叙事,个人生存欲望与国家民族大义的直接对接乃是那一代留日青年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并在创造社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李怡所言,“创造社青年的这一个人/国家的‘对接’模式影响着他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李怡,2009:179)。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随着五四退潮以后国民革命的高涨及其挫折,再到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创造社为何开始由艺术派向革命派的方向转换。即是说,创造社经历了从初期的“艺术派·浪漫派”到“向左转”,再到后期提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几个阶段,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革命意识和激进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们的文学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左倾文学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又不免染上了“普罗文学的通病”,时而陷入“歇斯底里的呐喊”^[15]。而我们注意到,在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相继刊出,即标志着创造社由前期转向后期的1928年前后,黄瀛也关注到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剧变,这从黄瀛对中国新诗,特别是对郭沫若、蒋光慈等的无产阶级诗歌所进行的译介活动中可以找到佐证,并因此而催生了《啊,将军!》和《世界的眼睛!》等黄瀛诗歌中稍显另类的反战诗。但纵观黄瀛1928年以后的诗歌会发现,毋宁说这寥寥几首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反战诗歌大有被淹没在众多个人叙事诗歌中的嫌疑,凸显出黄瀛坚守诗歌的纯粹性、艺术性和个体性的一贯立场。这也表现在了黄瀛不断强调的诗歌观中。他认为,在诗歌乃是时代先驱的中国,“从民族意识的觉醒发展到激烈阶级斗争的过程必然反映在文艺领域,使诗歌面临崭新的变化”^[16],所以“想到本该是文学上的‘诗歌’变成了社会的‘诗歌’,还是不胜欣喜”,但他却“绝对无意把这种变化视为正规之举”^[17]。也正因为秉持这种文学观,我们看

到,在1928-1930年之间,黄瀛的诗歌并没有就此走向对社会的直接描写,而是借助汲取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手法而不断拓展着描摹内心世界的手段,并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高产期。在这些诗歌中,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动荡,都只是化作一种浓重的阴翳笼罩在其文字四周,并经过重新组装而转化成了内在的个人叙事。所以,如果把黄瀛诗歌与同时代的中国新诗相比,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背后翻滚着同样的时代风云,弥漫着同样因中日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动荡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从而使它们能够被置于同一个时代坐标中加以相互比照,但黄瀛却依靠将外在现实带来的不安转化为对个人身份的困惑和认证,不是通过向外高声呐喊,而是借助向内浅唱低吟来达成了内在心象的忠实描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黄瀛乃是中国新文学留日作家中少有地坚持从“个人本位”立场出发,自始至终关注着身份认同等现代性问题的艺术派诗人之一,从而丰富着中国新文学中留日派文学的宝库,让我们管窥到留日派文学中并不太多见但却确实存在的另一种姿态。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革命运动经历高涨与挫折,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本土迫切需要“文学上的诗歌”也变成“社会的诗歌”的情况下,黄瀛诗歌的异质性的同时也作为局限性而变得显而易见了。

与此相联动的现象是,与留日派作家大都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状,相信文学改革现实的力量,从而与由实学转向文学不同,黄瀛因听从母亲的劝告,怀疑文学不能成为立身之本和谋生手段,即基于个人角度的现实性考量,由文学转向了“实学”,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通讯技术和驯鸽技术。这种贯穿始终的个人立场让黄瀛可以游牧于诗人与军人的身份之间,多了几分随性和自由,同时也因缺少创造社成员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而难以萌生积极走向中国现实并投身其中的强烈欲望,未能达成“日本体验”与“本土需要”的契合,导致其诗歌成了悬浮在空中的、远离中国本土的无根之物。再加上语言的限制,黄瀛诗歌被隔离在同时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之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合理性。

不过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把黄瀛作为稍显例外的存在放置于新文学留日作家的谱系中来发现其意义。其实,只要看看留日作家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的经历就知道,当他们以弱国子民的身份留学于正在蓬勃兴起的日本时,他们所感受到的,其实更多的是生活的窘迫和留学的艰辛,而异族的歧视则强化了早已根植于内心的自卑感和民族主义情绪。换言之,留学日本的体验非但没有使他们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与文化之中,反倒巨大的反差和刺激中与日本社会渐行渐远,直至发展成厌恶和憎恨,甚至一度上升为“文学反日”的口号。所以,阅读创造社成员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既印证了国民情感层面的歧视和日本的侵略乃是中国人“留日反日”现象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反映出了新文学作家中留日派心灵历程的悲剧性。比如董炳月就注意到了中国留日者与一般中国人之反日的差异,认为中国留日者的反日具有多重悲剧性,其不仅体现在日本在本应出现合作者的群体中培养了异己力量,让众多留日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变得灰暗,更在于这种对立的出现使中日两国丧失了一条建立共通价值与共通观念的重要途径,进而直接影响到了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且在董炳月看来,上述悲剧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了“东亚”意识的消亡与人类主义精神的沦落上。^[18]不能不说,董炳月的上述论点作为一般论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但笔者认为,如果把黄瀛这样的特例也放在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中来加以考量的话,或许会有另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从最初作为弱国子民的悲剧性意识,到后来对中日关系恶化的焦虑,直至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觊觎中国的愤怒,黄瀛都与一般留日作家表现出了近似或相同的心路历程。但笔者也同时注意到了黄瀛身上的某些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显然又是与他特殊的日本体验密不可分的东西。比如,他借助在日本诗坛上的成功——而且是其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复制的奇迹般的成功——达成了对被歧视意识的暂时克服,而与日本诗人广泛的交友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他消除或缓解了心灵历程的悲剧

性,以至于与其他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在日本的青春并不完全是灰暗的,毋宁说还时而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也许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群体对日本普遍表现出的愤慨、无意识的距离感和矜持,黄瀛并不隐瞒自己对日本的乡愁和日本诗坛的留恋。在他身上并未体现为东亚意识的消亡或人类主义精神的沦落,毋宁说他反倒更迫切地祈望着个人的情感能够逾越国家和战争的坚壁,绽放出超越国界的世界主义的紫阳花。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黄瀛视为留日学生谱系中稍显异类的存在,但却是值得庆幸而又弥足珍贵的稀少存在,向我们展现了中日近现代文学多舛关系中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当他试图回归到朴素的个人情感来超越国家意识时,则也可能错失了沉潜到个人/群体、自我/民族这样的关系项中来展开深度思考,将自身的悲剧性与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让其诗歌在多重纠葛中获得本土性和现实张力的契机。

4 对被国民化的逃逸与“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

我们知道,黄瀛与同是《铜锣》同人的草野心平和宫泽贤治大肆活跃的20世纪上半叶,也正是中日两国国家意识强化、民族主义精神高涨的时期,亦是民众被高度“国民化”的时代,以至于作为国民的一员,作家们都也难以逃脱被“国民化”的命运。但我们却不难从黄瀛身上看到对被“国民化”的抵抗和逃逸,或至少是一种延宕,这可以从他宣称“没有比国境线更让我痴迷的尤物”^[9],执意坚守在两国国境线上的姿态中找到佐证。尽管他也借助“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的光荣”来表达了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知,但似乎他并不甘心于被中国人这种国民身份的内在规定性所完全束缚,而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出一种逃逸和解域化的趋势。这表现在他喜欢用“诗人”这一基于个体性立场的身份,而不是用“中国人”或“日本人”这样一种基于民族身份来定义自身的意志中。也正因为如此,他能超越日本人或中国人

这样一种民族立场,而作为一个人来清醒地看到,战争乃是“无聊梦境的延长”^[20],并在1991年赴日接受电视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日本人一个个都是好人,可一旦到了国家日本的层面,就变得糟糕了”^[21]。显然,不难从中看到黄瀛对国家主义的质疑和抵抗。其中渗透着一种对“国家”进行消解和抗拒的超国家意识,从而体现为一种人类主义。而对于黄瀛来说,其人类主义的根基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散发着体温的友情。

而这种对个人友情的坚守也体现在《铜锣》另一个同人草野心平身上,但却呈现出了既相似而又有所不同面貌。在岭南大学度过的青春时代给草野心平带来了同时代其他日本人所罕有的中国体验,并孕育了他对中国高度的亲近感和独特的中国观以及亚洲意识。而我们知道,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既是中日两国国家意识的觉醒期,同时也是超国家意识的形成期。特别是随着西方对东方的入侵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频繁交流,在中日知识人中间萌生了对于“东亚”的期待,即超越国家的东亚意识。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置身于这一语境的草野心平在把握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亚洲或东洋这一概念其实承担着多么重要的整合功能,得以将他心目中的两个故乡——中国和日本——一体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初那种源自中国体验的亚洲主义与其说是观念性的,不如说是感性的,散发着体温的情感,但在日本与中国全面开战,“近代的超克”论和变质的大亚洲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草野心平与大多数日本作家一样,逐渐趋同于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我们不妨把这也视为“被国民化”的结果。而草野心平战争期间从先是陷入黯淡的心境,再到对战争引吭高歌的变化,不妨视为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从抵抗到消极认同再到积极配合的过程,也是草野心平从在中国孕育的“亚洲之民”意识——即“非国民意识”——向“国民意识”倒退的见证。在那样一个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民众都被迫“国民化”的时代,草野心平也未能幸免于此,毋宁说他最初所抱持的亚洲意识或东洋理想不仅未能帮助他超越国家的架构,反而以扭曲的形态成

了驱使他同化于大东亚意识形态的“共犯”。但我们也注意到,战后草野心平继续坚守着他的“亚细亚的梦想”,并走向了世界主义和宇宙主义。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因略去对战争责任的反省而凌空走向的宇宙主义和世界主义不免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也不妨视为他在经历过战争后,试图重新出发,来超越狭隘的“国民性”立场的一种体现。换言之,他和黄瀛一样,不愿再相信“国家”,而甘愿回到个人立场来坚守与中国友人的友情,并以此为基点来超越国家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人类意识和世界主义,直至超越人类的架构,呈现为更大规模上的宇宙意识。

伊藤虎丸曾无限感慨地说道:“1937年以来,文化上的交流也完全断绝了,直到今天,两国文学之间的距离仍然是很远的。想到这一点,就不能不令人怀念两国文学之间有过蜜月时代”(伊藤虎丸,2005:146)。而他所谓的“蜜月时代”,就是指大正时期到昭和初年围绕着“文学”这一领域,两国的文学者,有着共同的知识和概念的时代,是“一个彼此可以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伊藤虎丸,2005:145)。而笔者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聚集在《铜锣》周围的中国人黄瀛与日本人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彼此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用黄瀛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国籍,也

别无他念,而只管“抱着不服输的心理,把写诗视为第一要义”^[22]。而这也体现在草野心平岭南大学时代与中国诗人刘燧元、叶启芳、梁宗岱等的亲密交往和相互激励中。换言之,那是一个纯粹地分享着文学乐趣的美好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铜锣》同人的亲密交往就得益于这样一种“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成为佐证这一“幸福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在国家和战争的坚壁前却像鸡蛋般脆弱易碎的生动案例。

作为那个“幸福的时代”以及其后那场不幸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黄瀛的诗歌记录了他与日本诗人友好交往的温馨片段,也同时记录了在日本逐渐暴露出侵华野心,并最终发动罪恶战争的过程中,其作为中日混血儿的不安、困窘和焦虑,以及最终达成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国籍的诗人,他用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日语所写成的诗歌勾勒出了其中日两种语言、文化以及身份中游弋的轨迹,揭示出了遭到主流诗歌有意遮蔽或无意漏视的某些侧面甚或重要的细节,从而得以在与同时代的中心话语与主流叙事的对照中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重构中化作具有生产性的鲜活一页。

注

- [1] 内堀弘.ボン書店の幻[M].京都:白地社,1992:227-230.
- [2] 安藤一郎.黄瀛と僕と詩集「瑞枝」[J].L'ESPRIT NOUVEAU,1934(1):67.
- [3] 冈村民夫.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以日语文学为视点[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1):19.
- [4] 佐藤竜一.宮沢賢治の詩友・黄瀛の生涯[M].東京:コールサク社,2016:253.
- [5] 奥野信太郎.黄瀛诗集跋[C].王敏.诗人黄瀛,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254.
- [6] 小小森陽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学[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5-8.
- [7] 郁达夫.雪夜//郁达夫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658.
- [8]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4.
- [9] 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4.
- [10] 郁达夫.沉沦[M]//郁达夫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50.
- [11] 黄瀛.天津路的夜景[M]//瑞枝.東京:ボン書店,1934:192.对该诗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杨伟.“少数文学”视域下的黄瀛诗歌与宫泽贤治诗歌[J].外国文学评论,2015(1):168-169.
- [12]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4.
- [13] 奥野信太郎.詩人黄瀛のこと[M]//奥野信太郎随想全集第5卷.東京:福武書店,1984:237.

- [14] 黄瀛. 詩人交遊録[J]. 詩神, 1930(9): 82.
- [15] 黄瀛. 金陵城から——現中国新文学の缺陷と今後の展望[J]. 作品, 1931(9): 40.
- [16] 黄瀛. 中国詩壇の現在[C]. 百田宗治編. 世界新興詩派研究, 東京: 金星堂, 1929: 356.
- [17] 黄瀛. 中国詩壇小述[J]. 詩と詩論, 1929(6): 324.
- [18] 董炳月. “国民作家”の立場——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243-244.
- [19] 黄瀛. 妹への手紙(2)[M]//瑞枝. 東京: ポン書店, 1934: 94.
- [20] 黄瀛. 心平への戯れ書き—眠れないとはどういうわけか? [J]. 人間, 1947(7): 151.
- [21] [2019-09-01] <https://blogs.yahoo.co.jp/badaguan103/43438329.html> 据称是黄瀛1991年接受日本某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话。
- [22] 黄瀛. 弔念草野心平[J]. 歷程, 1990(2): 155.

参考文献

- 安藤元雄、大岡信、中村稔監修. 現代詩大事典[M]. 東京: 三省堂, 2008.
- 佐藤竜一. 黄瀛—その詩と数奇な生涯[M]. 東京: 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 1994.
- 詩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M]. 東京: 蒼土舎, 1984.

作者简介: 杨伟(1963—) 男 汉族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yukio717@163.com

作者简介: 陈潇潇(1980—) 女 汉族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学专业博士 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chenxx127@hotmail.com

A Study of Huang Ying'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Abstract: Huang Ying, a Sino-Japanese mixed-race poet, was active in the Japanese poetic spher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His poetry shows evidence of "hybridity" in terms of its language, culture and existentialism. Due to such hybridity, his poetry is excluded from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the no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eviates from the simple defining model "Japan=Japanese=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o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kewise deviates from "China=Chinese=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research is more exclusive for the marginalized works. For this reason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ider a unique value and possible productivity by positioning Huang Ying in the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taking him as a "special" Chinese poe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literary context.

Keywords: Huang Ying; hybridity; literary history reconstruction; reevaluation

Authors' Information:

Yang Wei (male) Year of Birth: 1963

Professor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yukio717@163.com

Chen Xiaoxiao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0

Doctoral Student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chenxx127@hotmail.com